

琉璃·影

心灵·舒坊

阳光下，母亲戴着老花镜，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，滚着鞋边，是那样认真，那样专注，那样慈祥。

■ 叶子

每天下班，我习惯脱下冰冷的皮凉鞋，换上柔软舒适的布鞋，那是一双青色的、方头的平底布鞋，我母亲做的。

自我记事起，母亲做的布鞋便是全村最有名的。她做的布鞋，无论式样还是脚感都很好，是众人效仿的样板。而不管是在过去的农村，还是现在的城市，只要是母亲待过的地方，就会变成布鞋流行的地方。

做布鞋这活儿，工序挺复杂的。首先，要学会选料，母亲做的布鞋之所以柔软舒适，透气排汗，原因是选用了纯棉布纳鞋底，而且棉布要用旧的。母亲做鞋子用的鞋底料，全都是旧的棉布，全是我们兄弟几个穿小的棉布内衣进行再利用。找一个太阳大的日子，烧一锅开水，撒一些碱，将旧棉衣剪成布块洗净。待晒干后，将棉布收回家中抚平，在家里放些日子，美其名曰：“收身”。

鞋底料子准备好，接着就是粘布壳子。母亲总是把我的房门下了，用它作为粘布壳子的道具。先把木门平放在小方桌上，然后用细米熬成的面糊涂在门板上，涂一层面糊就粘一层布。从上到下，把整个门粘满，一直粘到有三四毫米厚度。做好这些后，把门竖起来，靠着墙根，对着太阳狠狠的晒。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，就晒好了，干透了。然后把它从门板上撕下来，卷成筒状，放在衣柜里，待到闲下来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纳鞋底了。

鞋面子，通常都是用买的新布做，这样才显得光亮。一把剪刀，一个顶针，一筒线，一口大号的针，在每一个冬闲的日子里便是母亲最忠实的伙伴。阳光下的院子里，母亲便和邻居的阿婶们说闲话，唠家常，一边晒太阳一边纳鞋底，欢声笑语溢满农家小院。一年的艰辛和困苦，都在此刻化为乌有。

小时候，最让我高兴的事就是在大年初一穿上母亲做的新布鞋，去给左邻右舍的叔叔婶婶们拜年。与其说是去拜年，还不如说是去炫耀我那漂亮的新布鞋。每到那时，都会得到大人们恭维的赞美声。

在上中学之前，我从不知道穿皮鞋是种什么感觉，是一路穿着母亲做的布鞋走过来的。缘于布料，我得到了老师的关注，同学们的羡慕。上小学的时候，我的成绩不好，尤其是数学，从未及格过。不是我太笨，而是我根本就不想好好学。我的数学老师是个女老师，她很凶，看不惯她，故意上课不听讲。有一次，我在操场上玩，脚上穿的就是母亲做的布鞋。被她看见了，问我为鞋是谁做的，我骄傲地告诉她是我母亲做的。她便笑着要我带鞋样子给她看，并请我母亲教她做布鞋。自那以后，她便经常来我家，跟我母亲学做布鞋。当然，还免费给我开小灶。就这样一来二去的我们慢慢熟悉了，就觉得她并不那么讨厌，开始认真地学习。成绩赶了上去，她让我当了班长。

长大以后，我进城了，工作了，母亲也从农村来到了城市。她是个勤劳惯了的人，没事做的时候总觉得闷得慌，于是又重操旧业，一年四季手不离针线。阳光下，母亲戴着老花镜，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，滚着鞋边，是那样认真，那样专注，那样慈祥。街坊邻居的老太太们也争相效仿，在一针一线中雕刻着晚年的幸福时光。

母亲话不多，可她人缘极好。在我们那个小区，母亲的知名度很高。提起那个做布鞋的乡下老太婆，人们总会赞不绝口。母亲很平凡，一个很普通的乡下妇女靠着她做布鞋的绝活，认识了不少城里人，冲淡了她那浓浓的乡愁，为她在城里的晚年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。每天下班回到家里，我总能看见母亲幸福的笑脸，听她讲着新鲜事儿。

前不久，我搬进新房，母亲一下子拿出二十双布拖鞋，和以往相比在颜色上有所创新。不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黑色，而是五颜六色、色彩斑斓的。摆在嫣红的地毯上，屋里显得生机勃勃。几个来串门的朋友，看见母亲做的布拖鞋，个个赞不绝口，爱不释手。结果，二十双拖鞋留在我家的只有几双了。

说起穿鞋，我穿皮鞋的时间远没有穿布鞋的时间长，许多年来，这种习惯从未改变。穿起布鞋，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母亲的叮叮、嘱咐，她慈祥的面容在眼前浮现，心里就特别踏实。

母亲做的布鞋

站地，步行用不了半个小时。自1949年参军离开上海后，她近10年时间内没有探过家。她多么想见到亲人啊！可是阮荷珍严格遵守上级规定，压制着强烈的思亲之情和浓浓的乡愁，没有独自迈出招待所半步，她只能利用乘车进出机场的机会，从车窗里向外观望变化着的大上海，寻找儿时的记忆，阮荷珍真正做到了三过家门而不入。

1959年她父亲被打成“历史反革命”，被捕入狱。她不能再飞行了。同年10月，上级给阮荷珍正式下达了停飞命令，她也因此没能入党。直到1978年她父亲被平反昭雪，阮荷珍背了整整二十年的政治包袱才卸掉。1979年4月，47岁的阮荷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实现了一生中的最大愿望。阮荷珍一生热爱中国共产党，身处逆境的时候，也没有动摇共产主义信念，也没有放弃入党的目标。从参军的那一年起，她每年都要写入党申请书，一写就是二十八年。

笔者曾问过阮大姐，你这一辈子写过多少份入党申请书？她异常激动地回答道：“晓红，你让我说具体数字我说不出来，因为次数太多，我实在记不清了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，自穿上军装开始，二十八年间，我每年都要写入党申请书，都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。纵然一辈不能履行入党手续，我也是一名永远忠于党的共产党员。”

入党第二年，她就被评为优秀党员。很多人都忌讳“13”这个数字，而阮荷珍大姐却特别钟爱这个数字。她喜欢穿印有13号号码的运动衫，还特地穿着它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半身相，在照片的背面还写上了“我最吉利的数字”7个字。阮荷珍大姐为啥对“13”情有独钟？原来这是她的结婚纪念日，这天上午，她与飞行员战友陆琦领取了结婚证，结为夫妻。

阮大姐婚后生活充实甜蜜，她与陆琦相敬如宾，患难与共，走过了银婚、金婚、钻石婚，直至白金婚迈进时，疾病终止了她前进的脚步。这一天正好也是“6月13日”，是阮大姐最钟爱的日子。这不是巧合，更不是什么天意，而是阮大姐的最终选择，她要在自己钟爱的日子里，含着微笑与亲人告别，带着喜庆离开这充满爱的世界。

阮荷珍大姐的一生是无悔的一生，是鲜亮的一生，是不负韶华、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一生。

朝花夕拾

昂贵到让人咋舌，是马化腾对员工健康的大投入。我无缘做腾讯的员工，如今退休在家，却有人送给了我腾讯员工部分相同待遇的椅子，这又足以让我能无端自豪一番，感慨一番。

遥望南天，记得家中读书郎幼时最爱坐我的脖子，手揪我的耳朵，喊“驾！”莫非，他如今也偶然想起幼时的亲情，就如同我怀念那把暗红的“椅骨头”？



徐建军/摄

拱桥

这不是巧合，更不是什么天意，而是阮大姐的最终选择，她要在自己钟爱的日子里，含着微笑与亲人告别，带着喜庆离开这充满爱的世界。

悼念阮荷珍

■ 苗晓红

惊悉新中国第一位单独驾机飞天的女性阮荷珍大姐，因病于2022年6月13日，在上海逝世，享年90岁。她的离去，让中国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蓝天女儿，中国女性失去了一位开创新中国女飞历史的老大姐。万分悲痛之余，特发此文，悼念阮大姐的在天之灵，寄托绵绵哀思。

阮荷珍1932年8月出生在上海，1949年9月入伍，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上海民立女子中学（现为上海十中）上学时，她响应党的号召，报名参军，被选为新中国首批女飞行员，1951年1月进东北牡丹江空军第七航校学习飞行，同年12月航校毕业后，分到北京空军第三团飞行。1959年10月停飞，飞行1300小时。阮荷珍1960年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，1970年转至湖北襄樊市（现襄阳市）卫生局，1987年9月离休。

纵观阮荷珍90年的人生历程，她顺畅过，欢乐过，辉煌过。但也委屈过，困苦过，失落过。不过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阮大姐始终是坚强的、睿智的、乐观的，幸福的，这是阮大姐一生的主线。

第一批女飞行员人人争强好胜，不甘人后，她们不仅与男飞行学员飙着干，姐妹们之间也较着劲，都想争取第一个放单飞。第一个放单飞，即意味着她是新中国第一个独立飞上蓝天的女性，这是一份荣誉，一庄史绩，意义非同小可。为了这份荣耀，在几个飞得最好的蓝天姐妹之间暗暗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。

校领导和教员组对此非常重视，第一个放单飞的学员能否成功，关系到整个女飞行学员班飞行自信心能否确立的大问题，也是最终击破“女同志柔弱胆小，不适合开飞机，螺旋桨一转不把她们吓跑也会将她们吹走”等流言的关键，更是能否完成“一定将她们培养成飞行员，一个也不能掉队”的任务、具有决定性的一步。他们根据14名女飞行员平时的飞行成绩和身体、心理素质，经反复研究，确定了第一批放单飞人员名单，她们是秦桂芳、阮荷珍、伍竹迪、王坚四人，至于谁第一个放单飞，由魏坚校长亲自考核后再定。

阮荷珍虽然开始不顺，病了半个月，但她经过刻苦努力，加上她聪颖机敏，不但没落下飞行进度，反而成了飞得好的学员之一。魏坚校长检查阮荷珍3个起落之



后，给她的成绩全是A，并批准她第一个放单飞。阮荷珍在她寄给笔者的回忆录中，详细讲述了她放单飞时的情景，她写道：“1951年7月6日，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这天天气很好，所有的飞机都停飞了，平时嘈杂的机场顿时变得非常寂静。我的心紧张得快要跳出来了。我进座舱后，赵教员再一次嘱咐我‘你的技术我完全信得过，就照平时那样飞，不要紧张。’我冲教员使劲点了点头。飞机稳稳地起飞，做了一个本场航线轻轻地着陆了。我单飞得很好，机场上的人欢腾了，我也松了口气，很开心。赵教员说，魏校长对我的单飞很满意，我笑了。”就这样阮荷珍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独立驾驶飞机飞上蓝天的女性。

1951年7月6日，不仅是阮荷珍终生难忘的大喜之日，也是创造新中国妇女历史的日子，它向全世界宣布，中国女性冲破了一切艰难险阻，独立驾机飞上了蓝天。她们如破壳而出的雏鹰，有了自己的飞行生命。1951年7月6日，是新中国女飞行员的诞生日，应载入史册，值得纪念。

阮荷珍到部队后执行了大量的飞行任务，她给被困的灾民空投过食品；给遭受雪灾的牧民空投过粮食与饲料；给志愿军运送过军用物资。除此之外，她执行过大量专机任务，1955年阮荷珍被评为空军二级优秀飞行员。她在万里云天，用一杆一舵书写出了不少传奇故事。

头砸到腿。我坐教室的前排，上课时不止一次听到教室后面“咚”的一声，引发满堂嗤嗤偷笑，不用回头也明白发生了什么。

说来实在难为情，我父母带孩子从遥远之地归来，家中一贫如洗，真的拿不出凳子。但我总不能在课堂上站着或蹲着听课吧？幸亏家对门的大五哥心生同情，认定我是个读书的料，主动提出将他家一只“椅骨头”借我，让我带到学校，解决了我一大难题。这只“椅骨头”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把椅子。

“椅骨头”应该叫方凳。村人又为什么不叫方凳？其实也不无道理。凳子的四条腿都是张开的，榫头一定要考虑这个张开度，凳子才放得稳，人坐其上也坐得稳。这“椅骨头”四条腿垂直，如果一方加上靠背，那就成了椅子。现在是没有靠背，那就成了椅子的“骨头”。我坐的这只“准椅子”，还刷了暗红色的浑水漆，色调热烈而沉稳，人坐其上感觉非常好。这一坐就是两年。放假时，我要扛起来回家，我感觉扛它在肩，就是它坐在我的肩上，骑在我的肩上，我怀着感恩的心情让它骑着我回家。开学后，再扛着它返校。一来一回，肩上仿佛飘着两缕看不见的红绸带，极像授勋颁奖时的红受带。

步入社会，又是天南地北一番折腾数年。当我那年清明节回到故乡祭祖，路过早已关门迁徙的母校，忽然眼前有一朵红云飘过，心头热浪涌起。我连忙找到大五哥家，塞一个红包给他的老来得娇子。但说到感恩的当年那只“椅骨头”，他一脸茫然，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。这更加深了我的自责，报答是万万拖欠不得的，而我却拖欠了这么些年，都让人家给忘记了。

大五哥说，一只“椅骨头”哪值得1000块钱，这足够买一个班的桌椅了！太多了太多了，不能要不能要。

我按着他硬要塞还我的手说，大五哥，再推却，我就要下跪来恳求了。他这才收回手，说，读书人就是多礼。给了读书人一碗水，人家要还一口水井……

这事儿一晃又过去好多年了，连我自己也都有点淡忘了。今天，坐上家中读书郎网购的高档椅子，我又清晰如昨地记起了当年读高中时的椅子，还有自己的恩人。

至此，也猛然想起这把似曾相识的椅子，原来是那年到深圳参观，在刚建起的腾讯大楼里见到过的。记得当时，全国各地的文化记者对腾讯员工待遇啧啧赞叹的，居然是一把工作椅子。据说椅子是根据人体的结构，利用高科技原理研制出来的，价格

遥望南天，记得家中读书郎幼时最爱坐我的脖子，手揪我的耳朵，喊“驾！”莫非，他如今也偶然想起幼时的亲情，就如同我怀念那把暗红的“椅骨头”？

■ 老九

家中刚参加工作的读书郎，用他第一笔比较像样的收入，在海南给我买了一把好椅子。商家根据他的地址，快递到了千里外的姑苏城，几经组装，我就端坐其上了。

坐上新椅子的感觉非常好。左顾右盼，把玩摩挲，感觉有些面熟，却又一时想不起。

想得起的，自然是以往有关椅子的种种记忆。我想，大凡读过《水浒传》的人，一定对椅子有深刻的印象。这个印象，源自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：豹子头林冲、青面兽杨志、九纹龙史进、黑旋风李逵、智多星吴用……他们不但有绰号，还有一百单八将的排位，依据排位，每人各有一把交椅。这个交椅就像今人的席卡，位置非常讲究，错位不得。说白了，这把椅子，决定了这位英雄在水泊梁山的地位。这椅子也是他们冲冲杀杀浴血奋战所拼得来。

今人席卡后面的那张椅子，同样也是汗水和智慧的生产物，得到者，当好生珍惜，在位子上做出不辱使命的作为。没有这张椅子者，也不必“仇椅”，人家是凭德凭能好不容易才得到的，德能配其位。我本人就是今生无缘得众目睽睽中的椅子者，我认定这是一枚吃不到嘴的葡萄葡。在职场咱有自己相应的操作台，台旁有一把不带隐喻和象征的椅子，坐其上操作养家糊口；回到家，夜晚灯下读书写作或电视机前看电视，都有自己的椅子，也毫无失落感。如果愿意，还可以购置一把按摩椅或摇椅，家中享受。读书郎就知道我一生勤俭节省，不舍得买好椅子，他就来个先斩后奏，将一把好椅子送回家，拉父坐上，不坐也得坐，让我浮想联翩。

我想我最先接触的椅子，一定是在读高中时。当时的农村高中穷，学生必须自带凳子。这凳子与椅子是有区别的，凳子也叫长板凳，一般都是两三人合坐的；椅子则只能单坐。似乎长板凳有点像使长枪的士兵，椅子更像斜插短枪的军官。课堂中原本就应该是两人合坐长凳，我又怎么坐起了椅子呢？其中有故事。

我的高中母校叫金湖高中，名儿好听，实则既无金更无湖。已经盖起了教室，教室里有桌子，讲台后有黑板，估计硬件实在是无力添置了，才让学生自备凳子。于是乎，教室中同学们坐的凳子，一律是自己从家中所带。有的同学离家远，又实在拿不出凳子，就与同桌用砖头码起两个墩子，上搁一块木板，当凳子。人坐其上形同坐船，一定得悠着点，弄不好墙倾榻摧，“凳子”垮了，跌个跟头算好的，最担心的是砖

家中新添好椅子